

美国公共外交面相的多维呈现

——评《美国公共外交史论》

肖宗志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公共外交作为美国一以贯之的对外战略,显然已成为目前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实证研究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国内并没有一部关于美国公共外交史的专著问世。可喜的是,胡腾蛟博士2018年推出的《美国公共外交史论》弥补了这一不足。在中华民族日益迈向伟大复兴的今天,该成果的出版对于我国公共外交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海外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作者通过挖掘新的档案文献资料,秉持整体史观,对美国公共外交面相进行了多维呈现。其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从历史长时段的视角,系统梳理了美国公共外交的嬗变进程

美国公共外交的演变历程是研究的热点,学界对此不乏阶段性的梳理^[1-2],但这仍然不够。《美国公共外交史论》从历史长时段的视角,系统梳理了美国公共外交的嬗变进程,解决了美国国家形象塑造的战略机制及其内在动因问题。作者指出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本来是精英外交,但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总体战”的出现,其范畴得以极大拓展,面向更为广泛的普通大众,“公共外交”应运而生。这种以塑造国际公共舆论、解释本国政策理念以及传播核心价值观为目的的新型外交,就被称之为“公共外交”。

美国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时至今日,美国公共外交历经早期萌生(立国至二战结束)、冷战转型(1947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式诞生(196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和冷战后复兴(21世纪初至今)四个阶段。在早期发展阶段,美国公共外交在一战中得以真正勃兴、在二战

中得以强化;冷战爆发后,美国公共外交迈向冷战转型之路,最终充当美国反苏的意识形态武器;196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公共外交成为美国外交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后,美国公共外交一度被冷落,但“9·11”事件发生后又得以复兴,充当反恐战争的意识形态武器。

通过上述梳理,作者最后得出结论说,“无论风云如何变幻,美国的公共外交传播本国核心价值观、塑造海外积极形象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过。这也是其发展的根本动因所在”^{[3]69},这就使读者得以明白,为何美国官方如此重视公共外交活动。

二 从文本解读与话语分析的视角,全面阐释了美国公共外交的主旨与内容

作者对美国公共外交塑造国家形象的主旨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这具体包括对他者—敌人形象的妖魔化和对自我国家形象的美化两个维度。就前者而言,著者在第二、三章中,着重剖析了美国政府如何妖魔化冷战敌人——苏联形象的个案。作者首先对他者—敌人形象塑造进行了理论溯源,然后对美国政府如何利用媒介对苏联敌人形象的塑造进行了详尽披露。他指出,冷战爆发后,随着美苏关系的日趋恶化,美国在观念上和实际行动中逐渐将苏联当作自己的“头号敌人”,启动“真相战役”,利用电台、展览、图书、宣传册等手段,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各个层面,不遗余力地对苏联形象进行全方位歪曲,建构所谓的“敌人形象”,进而使受众服膺与效仿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赢得冷战的胜利。因此,“黑暗”“独裁”“残酷”“封闭”“落后”“红色殖民主义”等种种贬义词汇成为美国标识苏联“邪恶帝国”形象的核心元素。这充分揭露了“公共外交充当美国政府冷战工具的实质”^{[3]71}。

[收稿日期] 2020-07-17

[作者简介] 肖宗志(1964—),男,湖南常德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就后者而言,作者在第四、五、六章中,全面展现了美国对自我国家形象的高度美化。作者将重点放在冷战期间。他指出,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主要通过借重国际广播、电影、图书、展览等媒介,对自身形象进行了系统塑造,不遗余力地展现其正面形象,以获得受众对美国价值的高度认同,最终赢得冷战的胜利。当然,各种传播手段在建构美国国家形象时侧重点有所不同。譬如,好莱坞电影主要彰显崇尚个人自由、追求自我幸福、倡导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如“美国精神”或“美国价值”。而美国海外图书和国际展览主要致力于展现一幅美国“经济富足、政治民主、文化多元”等形象。显然,这是一种溢美之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美国公共外交的内容进行了尽量挖掘、创新。“自由欧洲电台”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主题设想与宣传、美国海外图书传播的政策制定和传播态势、美国海外展览项目等一些重要史实得以充分挖掘出来。这些新史料的挖掘与运用,将美国公共外交的丰富面相呈现了出来,无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美国外交政策的实质。

三 从效果评价的视角,尝试评估了美国公共外交的成败得失

公共外交效果评价始终是一个极为重要,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的问题。该著显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著者在总结学界关于公共外交影响力提升项目、使团行为追踪法和公共外交绩效测评模型三种评价方法的基础上,尝试对美国公共外交的即时效果与深远影响进行评价。作者指出,美国公共外交始终肩负着塑造国家形象、解释政策和输出价值观念三大历史使命。为了实现上述三大目的,因应各种战争情势的挑战,美国政府逐渐确立起了“战略化”的公共外交模式。它大体遵循着总统与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美国新闻署—驻外使馆的领导机制。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公民个体等是美国公共外交的有效参与者,从而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国家—私人合作网络^{[3]244-245}。这一模式具有强烈的国家意志、意识形态进攻性,从而确保了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

其一,美国公共外交有助于美国击败它的敌人。在美国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曾先后面临着纳粹德国、共产主义苏联、恐怖主义势力“塔利班”的挑战。尽管这些挑战者的最终落败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公共外交在击败它们的过程中确实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凸

现了意识形态渗透和思想征服的威力。这也是时至今日,美国官方为何还重视公共外交投入的原因所在。

其二,美国公共外交推动了海外受众对美国价值的高度认同。可以说,美国政府自立国以来,通过持久的、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宣传,极力鼓吹“美国梦”的普世性,宣称美国制度真正值得效仿,从而空前强化了“美国神话”的建构。这些夸耀性的话语和修辞对一些国家的精英产生了狂热的“致命诱惑”,他们竟然因此在本国大搞“街头政治”、民主抗议活动,要求照搬照抄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国家动荡不安、社会分崩离析、民众生活困苦不堪,最终陷入痛苦的转型之中而不能自拔。

其三,美国公共外交因应国际形势变革不断进行调适,为国家软实力战略服务。冷战结束后,美国公共外交日益成为一种综合性战略的产物。它更加忠实地为地缘政治、反恐和国家形象修复三大战略服务,以建构美国强大的“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为了确保良好的效果,美国公共外交适应世界信息化和非对称性的特点,积极推动自身“去中心化”和“扁平化”,更加强调以公众为主体,着手解决“有效性”问题,以最大程度捍卫其全球性利益。当然,公共外交有效性问题的解决,不在于它的形式或技巧有多么花哨,而在于美国放弃霸权主义战略和“美国优先”政策,改善自身行动。

总体来说,该著观点新颖,视野开阔,资料翔实,论证有力,不啻为一部前沿佳作。但稍嫌不足的是,由于作者将论述重心放在冷战时期,并且根据传播媒介来布局谋篇,似乎意在探讨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导致了美国在不同地区的公共外交举措的问题难以兼顾,而美国公共外交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私人组织和个人海外活动也没有充分言及,未免感到遗憾。期待著者能够继续努力,出版一部《美国公共外交通史》,以弥补上述缺陷。

[参考文献]

- [1] 刘鸣箐. 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17—2009)[D]. 长春: 吉林大学, 2011.
- [2] 梁昌明. 绩效视角下的美国公共外交研究(1945—2011)[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5.
- [3] 胡腾蛟. 美国公共外交史论[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8.

(本文编辑:魏玮)